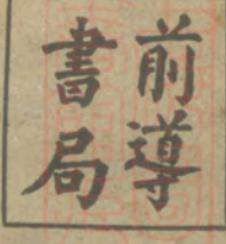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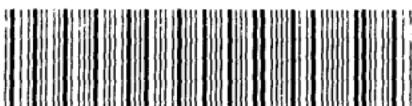


讀遠東的危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43058



書叢報港

機危的東遠讀



行發局書導前林桂



目 錄

前言

一本書的特色

二 揭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假面具

四

(一) 藉口保護僑民生命財產

八

(二) 藉口中國的動亂

一

(三) 藉口特殊權益與要求

一七

(四) 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積極與親善的政策

一九

(五) 藉口人口問題

二二

三 一二八事變之補記

二十五



20256761

四	軍部侵略與民族情緒	一一六
五	中國的「排外」	一一一
六	防止戰爭	一三二
七	中國必須抗戰	一三五
八	真正的和平	一三七
九	中日問題的澈底解決	一四一
十	中日問題的澈底解決	一四一
十一	法國革命與日本侵略	一四四
十二	史汀生氏的結論	一四六
十二	遠東問題的展望	一四九

前 言

原著出版不到兩個月，我國出版界便有兩種譯本：一部是大公報記者馬季廉先生譯的，名曰「遠東的危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版），由天津大公報出版。一部是正中書局出版，名曰「遠東之危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版）譯者爲曹明道先生，前者是用語體文譯的，後者是文言。同時日本也有兩種譯本出現：一種爲改造社的版子，名曰「極東的危機」；一種爲中央公論社的版子，譯名同；都是十一月出版。中日兩國，是這本書的主要對象，原著出版後，便有以上四種譯本，一方面固然是中日兩國皆關心他們自身所急待解決的問題，一方面也可知道史汀生氏這部書的價值及其吸引力之如何可以重視了！

一 本書的特色

美國前國務卿史汀生先生(Henry L. Stimson)，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發表了他論遠東大局的一部很有價值的著作——「遠東的危機——回顧與前瞻」(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這部書的特色是：

一 牠的著者，就是書中所描寫的世界舞台上一幕極慘酷的悲劇的一個主角。他所描寫或敍述的事實，自然比台下的觀眾從旁觀描寫或敍述的分外親切，言人之所不能言。

二 著者是一位美國的現代政治家，美國傳統的政治觀點與政治主張，頗與世界其他列強不同，尤其是對於中國問題，牠的立場顯然和其他列強不同。而且著者對於中國較之其他現代美國政治家更表示好感，而且懷

着更大的希望。

三 他所描寫的雖然只是中日兩國糾紛的問題，即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問題，然而這一問題，實際上乃是攬動整個太平洋安全的問題；而太平洋的安全問題又息息與全世界和平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從本書著者所描寫或敘述的事變和問題，以及關於此事變之行動，無異是在全世界的舞台上看一齣生死鬥爭的「角力」他所描寫的：有些地方是可泣可歌，驚天動地；有些是鬼魅蛇蝎，衣冠禽獸；有些是表示出狰狞面貌，好似兇神惡煞；有些雖然是紛紜錯亂，令人失望，但却顯露出前途的曙光。

有人說，史汀生先生這部有價值的著述，其特色之足以令人注意，既如上述，似乎我們沒有再加以批評的必要。那却不然。我們固然不願學日本少數人的那種狹隘的態度，看了人家指摘他們的錯誤，便一筆抹殺；我

們也不願學一班無頭腦的樂觀主義者，聽見人家對我們同情，便欣然色喜；我們要爲着中華民族之已往現在和將來的偉大前途，對於本書的著者表示誠懇的友誼；同時我們對於此書亦願予以友誼的批評。這種工作在我們中國人民是很必要的，即在太平洋周圍的各國人民甚至全世界各國人民也都是不必要的。惟在開始批評之前，還要讓我們說一說下筆時的態度：

一 我所說的中國，是指着她的人民大衆之集體而言。

二 我們對於日本六千萬人民毫無仇恨，我們所指摘的，只是日本的侵略集團。

三 本文純取客觀的態度：「是，還牠一個是；非，還牠一個非。」

二 揭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假面具

本書著者在世界的面前，揭破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假面具。爲

什麼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東三省的軍事佔領，不先不後地要選擇在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呢？史汀生先生道：

「……蓋數月來吾等方苦心孤詣，集中全神於其他方面，一九三一年春，長期之經濟恐慌在歐洲已瀕絕境，奧國國家銀行——即著名之The Credit Anstalt——之倒閉，在德國發生反響，威脅整個中歐經濟之安定。最後乃引起胡佛總統國際債務延期一年支付之提案，冀以防止世界性金融崩潰之大難。是年暑期，余亦曾費去一部份光陰，出席倫敦七強金融會議，巡歷巴黎與柏林，致力於此同一目的之實現。

在經英國時，曾親覩英倫銀行擠兌之發生，且即在九月十八日——東三省事件爆發之日——幾亦同一時間。余從英國代辦處，得英國將放棄金本位之消息。總之，此時世界自東徂西，政治與經濟方面似已均

在動搖之中。

「歐洲經濟危機之緊迫，撼搖美國銀行機構之安定。美國各處投資流入中歐者，為數幾達二億元之鉅。本國已經過兩年地方恐慌與衰落，此時又受此種威脅，其影響於銀行界者，其重大可想而知。國內銀行倒閉率迅速增加，不久即大有威脅國內整個信用制度之勢。情勢之惡劣，較當代人所經歷任何一次之危機皆見劇烈。……在此情勢之下，以應付世界對面新危機之時間與精力，所餘自屬有限。素抱不受他國干涉之自由觀念者——指日本——擇於此時，以計劃東三省事件之爆發，實為適得其時」。（曹譯本頁四一五，原文四一〇。）

時間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鷄鳴狗盜之雄，是最會選擇時間的，操奇計贏之輩，也最會選擇時間。同時，希特勒也會選擇時間，他於某年撕

破凡爾賽和約；莫索里尼一眼看穿了國際聯盟之已經破產，所以他敢於在去年吞噬了菲洲的僅有的一個獨立國，這時間的選擇再好沒有了，都不是偶然的。自然，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伸手，也沒有例外，誠如史汀生先生所說！這就是說，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行動，絕不是什麼應付臨時事變的非常手段，而是處心積慮謀定後動的行動！不但就發動時間，足以證明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東三省的軍事佔領，是侵略者的預謀；即就他的軍事行動之步驟看來，更足證明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野心，非伊朝夕。史汀生先生說：

「……但重要情勢，即行明顯。據日人所稱，彼等採取此種行動之原因，為中國人民對南滿鐵路之抵制運動。此說將日人此種行動，縮小至如此程度，顯然表示其為莫須有之事。同時發現日本軍隊之行

動，如此敏捷，顯然出於事前預謀。鐵路線上之衝突，雖發生於九月十八日晚十時，但日人在同夜內，竟攻下中國兵房、佔領儲藏整個東北軍火之瀋陽大兵工廠。並在黎明前，日本在東三省之全部軍隊與在朝鮮之一部分軍隊，已在東三省南部全區域內行動。……凡此均足證明此次行動爲一由東三省日本最高當局計劃裁可，甚或又經東京高級軍官指揮之周密行動。且當日軍佔領東三省南部各要衝時，行動之整飭確切，時間之安排周到，在在指明其非爲參謀當局策劃，決難實現完美之參謀工作。」（參照曹譯本頁二六一一二七，原文P.32—33）這並不需要我們再加以解釋，誰也可以用他的「常識」，來對日本帝國主義這種行動予以公平的裁判了。

(一) 藉口保護僑民生命財產

駁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各種藉口，有說明的必要，因爲日本每一次對中國進攻，總是說他爲保護僑民生命財產而行動；就是說出於「正當防衛」。史汀生先生說：

「一俟日本對國聯十月會議和平意向之抗議聲浪消沉，日軍進攻東三省北部之消息，即開始傳來。此次進攻，沿自四平街之中國鐵路，以達俄有中東鐵路上之昂昂溪。此次進攻，不特調動日軍至遠離南滿鐵路區域數百英里之處，目的且在直指東三省極北部之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此舉不特對張學良之殘存省分，爲一大打擊，抑且威脅俄國連接海參威之捷徑，是種行動，究與保護東三省南部日僑生命財產何涉，殊屬不可思議。從十一月四日至六日，日軍與馬占山將軍部下，曾有三日接觸。十一月八日，擁護張學良之馬占山部下已爲日軍所

毀滅，齊齊哈爾亦爲日軍所佔領。在此時期，日本政府曾向吾國與國聯，說明其此次行動，僅係北上保護爲中國土匪所燬之嫩江鐵橋之重建。馬占山軍隊，雖在距離如此遼遠之處，但仍威脅日本東三省南部之利益，以及一俟保護任務結束後，日軍即行撤退。此類辯白脆弱之表面，由地理上之情勢與日軍之行動，即可爲揭破。（曹譯頁五八一五九，原文P.70-71）

用「保護僑民的生命財產」的藉口，去侵佔隣國的領土，誰也知道這只是侵略的行爲。況且距離他的僑民所在地，還有千數百里之遙的省分，皆可在此口號之下，實行軍事佔領。那世界中各弱小國家的土地，都要聽強者隨便侵佔了。所以他在這個口號之下，佔領東三省全部，復由東三省推而至於熱河，察綏，冀東，整個的華北，再推而至於全中國。自然可以說，

蘇聯也威脅日本帝國的生命線，於是便可進攻西伯利亞，好讓他的僑民去嘗嘗貝加爾湖畔的鮮魚滋味。再者，南進呢？自然也可以說，英屬香港與新加坡，甚至菲律賓共和國，皆威脅着日本帝國的生命線，於是便可派遣他的海陸空軍，到這些地方，去盡他們的「保護僑民的任務」了。南國的風光，比日本的富士山的美景，還要引人入勝。但是這種推論的結果，就是說明了日本進攻中國的藉口，是永遠不能成立的。不然，就是世界的人道絕滅！

(二) 藉口中國的動亂

史汀生先生駁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又一藉口。就是日本常在國內與國際間，有計劃地搜集中國歷史上的遺物；如不潔的習慣，保守的風俗，封建社會的渣滓，盡量宣傳，藉以引起日本國內與國際間對中國人的

輕視，後來便藉爲侵略中國的口實。他說：

「誠然，從遠大處觀察歷史，估計其將來事變之可能性，不以幾十年而以幾百年計算，則居於日本島後大陸上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未來之發展，對於美國太平洋上之最後關係，將有極大——雖非極重大——影響，至爲明顯。四千年來，中國曾經繼續堅持其本身完整與特殊文化之保持與發展。彼雖常受他族侵襲，有時甚至爲他族征服，但征服彼者，最後乃爲彼所同化而消滅。惟彼仍能維持其與西方文明落後甚遠之文明」。（曹譯頁九——一〇，原文 p. 10.11）

這是人人知道的常識。因爲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千餘年的文化，實皆淵源於今日所日日侵略的中國。但是日本被美國海軍之一砲擊醒了，趕忙把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全部地搬到三島，於是甲午之役，日俄一戰，便證

實了他的變化的價值。中國則不然，他的歷史之久，疆域之大，交通之阻滯，人民之衆多，歷史上的積垢與外來的困難，絕不能如日本那樣幸運，那樣容易於最短時間革除而肅清之。但是這不是說他不進步，他不努力改革。所以史汀生先生說：

「但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終因不可避免之情勢，而開始其近代文化。在東三省事變發生前之近三十年間，中國乃在流動之大轉變中，彼曾專心一志於其行政與政府之革新，俾能適當應付近代世界種種問題。但中國因其幅員廣漠，行政與財政上之腐敗，以及人民重視家庭與地方，而漠視國家統一之故，其融化與轉變問題，較諸日本，其困難大至無限」。（曹譯頁一〇，原文二二）

可見中國之革新問題，較諸日本只有難易緩急之別，絕沒有可能不可

能的分別。我國的發展雖然緩慢，「但其革新之明證，仍難淹沒」。（曹

譯頁一〇，原文P.11）中國的發展，從農業手工業到機器工業，其艱難實十倍於日本。他的第一步艱鉅工作，就在排除三百年之久的滿洲統治。這

一民族革命的鬥爭，也並不是沒有支付他的寶貴而重大的代價的。然而日本維新却沒有經過這種鬥爭。中國地大物博，到處都惹人垂涎。人民雖然開始覺醒，開始轉變，但外來的壓迫，和有意的阻撓，使他不能順利地自由地邁步前進，這一層困難日本又沒有。因爲當日本明治維新之初，世界的資本主義尚有餘裕的殖民地，足供他們的尾閭，不必光顧到日本。況且日本以蕞爾三島，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對他不起欣羨之心，所以他能以從容走上他的工業國家之路。中國是沒有這種幸運的。然而惟其大也故一艱，惟其久也故難，中國的發展必經過千辛萬苦，且必經過長期的鬥爭，

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而且我們中國人民，自始就沒有對這一艱鉅的工作，表示畏葸；更自始就看清了這一前途，大無畏地一步一步向前進。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總樂意宣傳中國在這一長期苦鬥的過程中，所不可避免也為任何國家在其發展程途中所不可避免的一時的紛亂，說我們是無組織的國家，可以任由日本慢慢地宰割。實則這種不可避免的紛亂之另一方面，就是表示我們變革的動態。所以史汀生先生說：

「中國此一奮鬥時期，常被局外觀察者看作紊亂時代，此實大錯誤。蓋此種紛擾，乃一偉大民族，由其舊日之家族制度，踏進現世界近代民族主義之過程中，所必有之現象」。（曹譯頁一九，原文P.22）

我們的鄰邦，雖有百喙，恐怕也不能否認這種歷史的普遍真理罷。英國從十六世紀的大憲章運動，經過了幾十年的紛亂。法國大革命（從一七

八九年到一八七一年）經過了幾及一世紀的劇烈的對內對外的鬥爭。德國在十九世紀之初葉及中葉在統一的過程中經過了幾十年的戰爭。美國之有今日，乃是他們在獨立之戰與放奴之戰的長期苦鬥所獲得的結果。即就日本說，在明治維新以前的長期反封建割據的鬥爭，這一筆血賬恐怕也不是我們的「友邦」自己所能「數典忘祖」的吧。而我們中國現代所處的對內對外（尤其是對日本）的地位，其支撐應付，除舊布新之難，實十百倍於上述諸國的歷史。自然，日本侵略者他那不顧一切執行其大陸政策，向着中國進攻，那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是現代的中國已非數十年前被人分割的高麗台灣那樣的民族了。他有四萬萬五千萬的忠實耐勞的人民，這些人民有了近百年外來壓迫不可遺忘的教訓，他並且有了戊戌政變，

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之革命的經驗。他已不是一隻馴羊，而是

被人縛了四肢，然而正在掙扎中的獅子，這一層當然日本侵略者不願意而且也不能了解的。但是太平洋彼岸的友人——史汀生先生却見到這一層，給予我們以極可寶貴的同情，這是值得稱道的。

(三) 藉口特殊權益與要求

他又駁斥了日本帝國主義在東三省所謂「特殊權益與要求」的藉口，他說：

「東三省無論在事實上或法律上，乃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但日本人民則感覺彼等在此有歷史感情，與政治之利益，此種利益，有彼等之特殊權益與要求爲保障，此種要求與中國主權衝突，實爲勢所必至。更有使事態愈趨嚴重者，事實上其中若干權益，日人雖再三堅持，僅有籠統辭句之規定，並無無可反駁之公文材料，以資證實。日本

所根據之幾種條約，曾爲中國嚴詞聲明，或爲辭義不明，或爲成於強力壓迫」。（曹譯頁一七，原文 P.19.20）

日本帝國主義者之視東三省爲其特殊權益與要求所在地，實有三種因素，經過長久的時間孕育而成的。第一，日本帝國的傳統，經過中日，日俄兩役，對中國，尤其是對東三省儼然自視爲當地的主人，至少是戰勝者的地位。第二，自然是不成材的滿清政府和洪憲皇帝（袁世凱）以及其他的政治軍閥政府，他們或則要保持他們的統治或則要恢復帝制，怕遭人民激烈反對，遂不惜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乘火打劫的無理要求，惟命是聽，這種安外的結果，遂弄成日本在東三省忘其所以反客爲主的習慣。第三，日本明治維新而後，即定下了併吞中國的遠大計劃，從種種方面增加或人爲地——養成他的國民吞併中國的心理，而教育即其一端。尤其是小學教育。他在

國民小學的教科書上對於中國的文化極力醜詆，對於中國的物質財源怎樣豐富，尤其是東三省怎樣好，都形容得天花亂墜。並且已經把東三省的地圖劃入了日本的版圖。日本國民在小學生的時候，就深深地受了這種侵略的教育，那能不成爲今日的局面呢？但是日本人以及全世界的人們都應該深深地認識：我們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討袁之役，以及廣東北伐等等的革命行動，不僅在推翻某一統治者之人事的關係，並且是對他的賣國喪權的條約一個實際的否認！自今而後，將繼續的擴大這種否認。

(四) 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積極與親善的政策

史汀生先生論到日本帝國的政黨與軍閥兩派對華政策，竟把牠分成截然不同的兩種政策，他說：

……則在日本政治思想上，有一甚深之裂痕，與上面日本擁

護憲政之領袖與主張保守之軍事領袖之劃分，大體適相符合。此兩派各有其不同之政策，一派主張對華『親善』政策，一派主張對華『積極』政策。」（曹譯頁二四，原文 P.27）

實則日本政黨與軍閥不過是日本帝國的兩翼。軍人方面是對華「積極」，而所謂「親善」派對華並不是不「積極」，不過他們因對華利益觀點不同，遂生出緩急各異的侵略政策。積極的固然是要毫不猶疑，毫不客氣地馬上用軍事力量，完成他們的大陸政策；就是所謂「親善」，也不過在比較穩健，比較緩和而罩以同文同種等好聽名詞來實行侵略而已。就在日本帝國憲政鼎盛時期，不是曾照樣地侵略我們麼？我們的領土，他們照樣地佔去了，在被侵略者反正是一樣的！我們中國人民對此最有經驗，每逢我們的「友邦」對我們帶着笑臉，用他那不自然的外交辭令表示「親善」時

，我們總是誠惶誠恐地捏着一把汗，結果，我們的土地和權利總要喪失一些，所以我們聽見東鄰的「親善」呼聲比聽見他的飛機和轟炸聲還要提心吊胆，大家都蹙額而相告曰：「又來了！」但是我要告訴史汀生先生及本書的讀者：中國非好戰者，但是人家不打上門來，我們也絕不會去無故地掀起風波，自然「親善」也就容易說得出口。但是我們的「親善」有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就是必需在消滅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行動之後，由兩國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之實際的相互平等自由為原則的基礎上來實行的，那才是真「親善」咧！

(五) 藉口人口問題

不但此也，史汀生先生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另一口實——人口問題——雖然加以駁斥，但未見澈底，他說：

「吾人自甚明瞭：日本必須爲其日趨上增之人口，籌劃維持生活之嚴重經濟問題。吾人亦深知，日本對於此一問題，在大戰期間，曾擬以征服中國爲其殖民地之政策，尋求解決。但在幣原及其自由黨徒執政之年間，日本努力堅持，向與前此遵循之軍事途程之相反方向前進。自華盛頓會議至一九三一年九月之整十年中，日本不以武力尋覓市場，而取完全與此相反之商業擴張與政治睦鄰政策，彼以發展對外友好商務，供給其上增之人口，而不用武力，獲得移民出路。彼曾不顧極大困難與挑撥，仍堅忍循此方針前進……」（曹譯頁二八，原文 P.34-35）

史汀生先生稱讚幣原的政策，以爲他不從軍事途徑，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而從一個與之相反的途徑，即商業擴張與政治睦鄰政策亦可解決。

日本人口問題，即「獲得移民的出路」。實則這種說法不足以使日本軍閥心服，因為他們可以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以前我們在世界市場尚有活動餘地，而日本對他國移民尙未遭遇阻礙的時候，和平政策是可以的，但是到了世界市場因關稅壁壘日益加高，日本移民又到處碰壁時，則對中國之武力強制的佔領藉以解決當前的人口問題，亦屬萬不得已之舉。如果日本軍閥持此說以答，則史汀生先生恐將無可反駁。實則日本的「人口」問題完全是它侵略中國的煙幕。不但在日本有人口問題，在世界任何國家都有。但日本的人口問題也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口問題一樣，不是絕對人口過剩，而是相對的人口過剩。世界歷史上因絕對的人口過剩而發生經濟恐慌的也有，但是現在則此種現象却不多見，有之，則只是相對的人口過剩。所謂相對的人口過剩，乃是失業問題所引起。自從工業革命以後，技術

發達，生產日益合理化，于是就把工廠一部份工人拋在街頭，有時遇到生產過剩，商品停滯，工廠停工或裁減工人，又把一部份工人拋到街頭，這一種過剩人口，就叫做相對的人口過剩。可見這不是由於人口與地理面積之分布的關係。如就日本的人口分布與世界各國的人口分布說，他的密度也不見得比其他各國高，即使有高的，也不過幾個工業大都市，其北部如北海道區人口異常稀少，若果用移民來解決他的人口過剩問題，也只有先向他的國內人口稀少的地方移民起，然後再及其他。現在他不向內而向外，而且台灣已經成了他的帝國之一部分，為什麼從明治卅一年到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日本移往的人口才一一，三一人呢？可見得絲毫不是移民的問題，而是他的畸形發展資本主義的工業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原料產生地，廉價的人工出產地與其商品的偉大市場。質之史汀生先生以爲如何？

三 一二八事變之補記

史汀生先生對於日本軍隊轟炸上海閘北一舉，義形于色地斥責彼輩之殘忍野蠻，實在可感！但是必須補充說明的，原來日軍在上海尋釁的第一遭，是從三友實業社的棉織工廠開始，他們派了幾十個浪人到那裏去滋鬧，遂引起衝突，因此他們就開始放火，燒三友實業社的工廠。再日軍于「一二八」夜間，用他的軍用機轟炸我們的閘北，首先嘗到他的燒夷彈的滋味而蒙害最烈的，就是我們中國東南一個唯一的大出版機關，且為藏書極富的一個文化機關——上海商務印書館與東方圖書館！這兩處的焚燬絕不是偶然的呵！原來三友實業社是中國南方一個很大的棉織工業的組織，牠的出品在國內非常暢銷，因為牠是國貨而且價廉物美，因此排斥了日本的棉織物之侵入，每年為數實在不少。日本軍人的武器之瞄準，自然是帶着

他們的輕工業家的眼鏡的！商務印書館也是這樣。原來商務印書館當初有日本的股子在內，後來漸漸地把牠收回了，變成完全的華商公司，而且牠的發展是很可驚人的。牠的規模之宏大，技術之進步，營業之推廣，駿駿乎有駕日本的出版界而上之趨勢。而且商務印書館的職工，是上海工人羣衆當中，最優秀最前進的分子，他們在國民黨軍隊北伐時，曾為革命軍開路的先鋒。自然在反日的運動中，他們也是最勇敢的領導者。日軍轟炸機的燒夷彈，不炸他炸誰？這些情形非身歷其境的人不能道，自然史汀生先生也不知。

四 軍部侵略與民族情緒

史汀生先生非常重視日本民衆的民族情緒，固然是慎重將事恐怕操之過激，越發使大局不可收拾，所以他一則曰：在「準備維持條約義務時，

須賀明避免任何行動，挑撥日人擁護軍部反對幣原之民族情緒」！（曹譯頁三四，原文P.41——42.）再則曰：「即軍人背後，漸得日人強烈之民族情緒之支持，一如其軍事行動之迭奏勝利，鼓起日本之民族情緒者然」。

（曹譯頁四五，原文P.55）三則曰：「且有日人對東三省傳統感覺爲後

盾之強硬軍人，已將內閣克服，並獲舉國一致興奮情緒之擁護」。（曹譯頁六八一六九，原文P.82）四則曰：「軍人後面，則有日本人民之擁護」

（曹譯頁一一七，原文P.138）我們前面已經說過，日本人對於東三省之特殊權益的觀念，有種種主觀和客觀的歷史因素，但若果認這種民族情緒是絕對的，或是「舉國一致」的，那就不對的。日本的資本主義是很後進的，其發展是很畸形的，這種發展和牠的主觀的物質條件十分不相稱，歐戰時發了一筆橫財，一時工業生產，異常發達，但大戰而後，歐美各工業國

回復生產力後，對外貿易，尤其是對華貿易，恢復其在戰前原有的地位；而中國的民族工業，在英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幫助或投資的形式之下也漸次孕育出來，於是日本在中國的商業，前途很見黯淡，加以建築在一經濟利益的基礎上的太平洋的軍備問題，又使得神經過敏的日本資本家和軍人，寢饋不安，拼命地瘋狂似地做軍備的競賽，因此他的財政決算上的赤字，一年一年地增多，工人失業的日益增加，農民更是苦不堪言，農民的饑荒是無法解決，使他們走投無路。在這種情勢之下，法西斯的軍人，很容易用強奪弱小國或殖民地暫時的權利或勝利給他們打一針強心劑，使他們走到法西斯的旗幟之下，此日本軍人內閣之所以不能免也。然而我們要曉得這只是中風狂中之一時的現象。我們且拿九一八以後，日本士兵在東三省和上海與中國軍隊作戰的情緒來做個例罷！當日俄戰爭的

時候，日本軍隊從本國奉命出發，真是父勉其子，妻勉其夫，兄勉其弟，個個都諄諄的囑咐他們的「征人」：「不戰勝，毋寧死！」他們同俄國作戰也着實表現了一往無前的精神。但是近年以來，他們同中國人打仗，却大大地不然了。他們從本國出發的時候，大都是垂頭喪氣，父母妻子送他們的時候，也都只有痛哭，不似日俄戰爭時那樣地興奮了。現在其中已有一種很「不穩」的酵母正在醞釀了！上海一二八之役，遠征上海的日軍，居然有一聯隊受了共產黨人的宣傳，反對侵略戰爭，不聽命令的事情發生了。

這並不是現在的日本士兵，沒有日俄戰爭時候的日本軍人的勇敢，而是政治的問題使他們發生了不同的情緒。日俄戰役時，日本的資本主義正在如日方升的時候，而那時的俄國又為一個強大的隣國，既和日本爭霸東方，在日本，這一戰，實在是決定他的命運的關頭，所以那時的日本民衆

的民族情緒，實在可以說得上是「舉國一致」，故朝野上下都有志在必勝的決心，而今何如者？他們的統治者，固然對於中國是早有了整個計劃來處分的：

第一期 征服台灣；

第二期 征服朝鮮；

第三期 征服「滿」「蒙」及西伯利亞；

第四期 征服全中國。

自然當他們征服台灣，朝鮮，奪取「南滿」（日俄之役）勢力範圍的時候，日本的民衆還在鼓裏呆着，他們以為征服了人家的土地，于他們有甚好處，但結果只是死亡殘廢，孤兒寡婦，（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

）工業發展下的大批失業，他們的生活並沒有改善。于是乎他們漸漸地醒

來，大變而特變了。這種情景，不但在他的一般民衆中，一天嚴重一天地暴露出來，甚至也在他的軍隊中萌芽着，滋生着。他們已經曉得他們來征服中國，只是他們的統治者，借着他們的手，來殺害並征服他們的中國的兄弟姊妹，因而也就發生了動搖。總而言之，他們來同中國作戰，至少是師出無名，所以他們內心上皆抱着無限的痛苦和疑慮到中國來。若果不了解這種內部的變化，只看見他們在中國領土上演習或舉行什麼示威的時候所造作的緊張精神，那自然要做出錯誤的結論！我們敢正告史汀生先生及一般讀者，日本帝國主義者侵華的行動並未有獲得「日本人民之擁護」！

五 中國的「排外」

史汀生先生把引起中國「排外」的責任，歸之于外國對中國種種不平等的條約，這是很公平的，我們在前面已經申說過，但史汀生先生無意之

中把「排外」兩個字加在現在中國的民族運動的頭上實在不適宜，甚至把「極端的排外精神」硬派在我們身上，那更是大錯，不可以不辯！中國民族的「排外」運動只有一次，就是義和團的暴動。他們只知道報復，破壞

，不知道做有組織的積極行動，又因清廷一部份保守而愚昧的王公大臣，想利用這種情緒與團體，遂產生這種令人不快的結果。但至少這種運動是說明中國人並不是無條件的馴羊！若是史汀生先生這個名詞用得貼切，那只有這一次！自此以後，中國的民族運動，便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方面看來，他們所排的，只是壓迫中國民族，殺害他的民衆的侵略者。我們可正告史汀生先生，及其著作的各國讀者，我們不但不排其他各國對我們表示實際友誼的「外」，並且也不排日本人民大眾對我們同情的「外」！

六 防止戰爭

史汀生先生的「防止戰爭論」，也有進一步追求的必要。他預言未來世界戰爭絕不像威爾斯那樣文學地描寫而加以幻想，這是政治家的經驗之談。他說：

「未來之戰爭，其破壞性之激烈，及其範圍之廣大，較諸往昔，誠不可以道里計也。此種戰爭，若不予以制止，則吾人文明之危急，誠有不可設想者」。（曹譯貞二〇六，原文P.241）

誰不這樣說呢？但是無「有效地制止」這一戰爭之道奈何呢？我們聽着罷：

「余信惟有世界各國採取共同行動之一法。」（參看曹譯頁二〇六，原文P.241）

史汀生先生接着又誠懇地給我們解釋道：

「蓋戰爭一旦爆發，任一國家，無論其實力之如何強大，無論其地位之如何懸殊，亦不能避免經濟上之損害，及爲捲入旋渦之可能性也。」（參看曹譯及原文同前頁）

我們要問的，不是各國應否採取共同行動，而是：各國是否能採取共同行動？依我們的經驗和研究看來，各國絕對不能採取共同地防止戰爭的行動；反之，他們每一防止戰爭的共同行動，結果必然加緊戰爭的爆發性和破壞之激烈性。現在的國際形勢表現還不明白嗎？一方面法西斯的侵略集團要重行分配殖民地及世界市場，另一方面却主張維持現狀。在這種情勢下，任何一種國際會議，裁軍會議，海軍條約，什麼「公約」，皆等於廢紙。他們每一次會議之前，都使他們在「狗咬狼兩怕」的形勢中增加軍備，使他們格外加緊準備戰爭！現在世界已形成了兩個陣營和戰前一樣，

自然其範圍，與其恐怖程度比第一次大戰的前夜更萬分可怕。這是什麼趨勢呢？難道還有絲毫「共同行動」的可能嗎？

七 中國必須抗戰

史汀生先生對於中國武裝抗日的問題也懷着十分恐懼，他說：

「余從長時間觀察，預見日本之居心，或將發生牽涉全球，性質最嚴重之種種結果。中國素以之爲對抗敵人之和平武器——抵制——如爲剝奪，則其最後之辦法有二：即整軍經武，放棄和平傳統，而變爲一軍國主義者；或完全屈服於其武力較強之鄰國日本。此兩辦法之結果，對於世界和平，與英國數十年來在遠東努力尋求之和平貿易自由，均飽藏禍害。（參看曹譯頁一一四，原文P.135）

中國之不用武力抵抗，最大的原因不在他的軍備微弱，而在沒有一個

中心勢力起來領導抗戰，因為中國抗日的戰爭和其他國家開疆拓土或與人爭奪殖民地以及爭奪市場的戰爭不同。後一種戰爭的對手，大概都是強國，他們在國家的生存上都沒有十分必要去和人戰爭，只是殖民地與市場之爭奪，所以他們的戰爭一定要估計到雙方的力量，謀定後動。中國原來沒有因上述的情勢而和人發生戰爭的願望與要求，而是他的領土，主權，即國家民族所賴以生存之經濟的和政治的基礎被人侵奪，譬如，一個手無寸鐵的人，忽然見了一個暴客操刀而入，要來殺他，他這時屋內只有椅子凳子或木頭棍子，自然也毫不遲疑地拿了牠去和暴客抵抗。甚至一點憑藉也沒有，赤手空拳也要和他廝拚，斷沒有束手待斃的道理，也斷沒有讓他去從容計劃抵抗或籌備武器的機會。中國所處的情勢就是這樣。只有抵抗，無條件地毫不遲疑地抵抗，才可死中求生！我們國民根本就不以「抵制」

爲「對抗敵人之和平武器！」我們只要求動員全國的國民，把一切的力量都用在抗戰上，即使他暫時拋棄和平成爲一個軍國的國民，難道不是應該的麼？史汀生先生也知道：擺在我們中國人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武裝自己，積極抗戰；一條是投降日本。並且也曉得完全降服了日本於英美的和平貿易的自由有害，那麼爲什麼又怕我們自己武裝起來呢？我們要正告我們的朋友史汀生先生，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強——四萬萬五千萬——的中華民族一定應該武裝他自己，若果中國人沒有自衛武力，世界便沒有和平可言。

八 真正的和平

實則列強對於中日問題的態度之或偏於此，或偏於彼，或出于緩，或出于急，皆以各國自身的利益爲標準，就拿史汀生先生所說的英國做個例

吧。他說：

「英國因日本對其揚子江流域利益中樞之打擊，亦甚憤怒，因在各國制止日本之協力中，發揮其前此所無之精神。國聯全體會員國，則將東三省事件，由行政院移交大會辦理，並一致贊同對東三省所有行政改變之效力，採取『不承認主義』」。（曹譯頁九二—一九三，原文P.110—111）

英國在遠東若果沒有和美國切實結成堅固的合作體系以前，絕對不致單獨對付日本。原來希望日本不要在印度，新加坡，香港，加拿大等等地方侵犯其利益，因而對於中國問題，就不得不在最大的限度以內對日本讓步，但希望日本的鐵腕不要伸展到他的勢力範圍——揚子江流域——以內，自然在一個高度軍備的國家侵略弱國的情形下，若果真是要出來說一句有効力的公正話，除了拿出拳頭來，空口說白話，是沒有用的。但是美國

又怎樣呢？自然他對我們表示得比較親切得多了，就我們前面所介紹的史汀生先生對日本所下的判斷看來，史汀生先生未嘗不曉得：若果真是出於所謂正義人道，要出來做一個有力的公正人排難解紛，那就只有：一方面用他的物質力量，和優秀的技術無條件地武裝中國，一方面則拿出自己的武器來站在中國方面，我敢說，這時蘇聯更會站出來主張公道。太平洋兩岸的兩個世界強國拿出力量，來維持遠東和平，才能獲得真正和平。日本軍人攻擊上海，美國把太平洋會操的夏威夷的艦隊放在那兒不調回去，停止待命，對於使日本對上海的軍事行動趕快結束，有了很大的作用，這是史汀生先生自己承認的。若果他再能積極地更進一兩步擴大這種行動，那末，華北的局勢不會變到這個樣子，中國民衆的抗敵運動會更一日千里地高漲起來，使我們趕快完成抗敵獨立的使命。如同法國人從前幫助美國

獨立的那樣動作，那末，中國人民大眾真正要感激美國。但是美國對於日本的侵略始終只用文字與口頭來制止。綜觀史汀生先生所發表的此類言論，如：

「又有一事，須審慎從事者。非戰公約包括兩項條款，第一項完全關於戰爭……：即否認戰爭為達到國家政策之工具。第二項則異於是，乃規定簽約各國，從此不以和平方法以外之手段解決糾紛。」

（曹譯頁五一，原文P.61—62）

又說：

「美國不取職權以外之行動。」（曹譯頁五四，原文P.65）

又說：

「美國政府亦祇限於仰賴公衆輿論之制裁。在此情勢之下吾人不

能承諾制裁之施行，至爲明顯。」（曹譯頁六四，原文P. 76）

這裏根本表現所謂「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的一文不值。國與國的爭端，尤其是一個強國對弱國的領土主權之侵略所引起的嚴重局面，絕不是「和平方法」，「公衆輿論之制裁」等等所能解決的。難道以美國英國爲領導的列強及簽訂非戰公約的國家不明白這種道理嗎？

九 中日問題的澈底解決

史汀生先生在國聯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所通過的法議案後，「發表一公開文告，敘述在國聯指導之下，長期談判之進行狀況；美國對是項談判予以合作與贊助之努力；以及其個人對此次通過決定派遣中立調查團」案之滿意之後，寫了下列兩段文字：

「東三省問題之最後解決，須由中日兩方自己同意之某種方法行

之，吾國所關切者，即達到此種解決所用之方法，須與吾國參加之條約義務相一致，應不危及世界和平，且其結果，應不出於武力壓迫……

「另一方面，此項決議案之通過，毫無承認東三省迄所發生任何行動之意味。吾國政府爲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簽字者之一，對於該地所生之事變，不能無關切。此項決議案之未來效力，端賴雙方當事者能以誠意實施其不再發生敵對行動之誓言，及發揮該案指示最後解決方法諸規定之精神。……」（曹譯頁六七——六八，原文P.80—81）

一個強盜和一個被劫者，「能以誠意實施其不再發生敵對行動之誓言」，能以由行劫者與被劫者「兩方自己同意之某種方法」解決爭端；就是說：老虎可以和羔羊兩方自己同意來解決爭端，那他的結果誰也曉得，只

有被劫者把他的所有送給強盜，還要在條約上簽下「欣然承諾」的字樣；羔羊自己洗腸子讓老虎大啖一頓而已。

但是在另一歷史的偉大意義上，我們又會贊同史汀生先生的「必須由中日兩方自己同意之某種方法行之」，但只是「斷章取義」，而不是史汀生先生的原意。就是說：中日兩方的爭端（不僅是東三省問題）之最終的解決，和公平而澈底的解決，必須由中日兩國的最大多數的民衆的相互同意來解決，這是歷史的必然發展呵！只有放在這個天秤上，兩國的，因而也是太平洋的或整個世界的真正和平的合理解決，而這種合理解決之唯一的可能時機，只有中華民族抗戰到底，使日本侵略者受了致命的打擊，隨着而來的，便是中日兩國國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的一切一切上，親密地合作，什麼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十 法國革命與日本侵略

史汀生先生徵引歷史，也有斟酌的必要。譬如他說：

「歷史充滿教訓，指示背其道而馳之危險。一百五十年前，歐洲同盟各國干涉法國革命，適足煽燃其民族主義之火焰。外國干涉他國內政之危險，由此充分顯露。日本現在，正復如是。」（曹譯頁二九，原文P.36—37）

史汀生先生所謂內政乃是指幣原的外交政策與當時日本軍人的對外政策不能和諧，深恐外國干涉，適足以激起日本的民族情感，這也有相當的理由。但史汀生先生不曉得日本的大多數民衆並不支持他們政府的侵略政策，我們前面已經詳細指陳出來了。至於以法國革命爲喻，亦不盡然。史汀生先生所指的「一百五十年前」的法國革命，想必是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



革命了。這一次的革命完全爲法國人民自己推翻專制王朝而起，完全屬於內政問題，其他各國絕對無干涉之權。只以法國這次革命，是歐洲歷史上空前的一次偉大的民主革命，牠掀動了歐洲革命狂潮，嚇得全歐的統治者，各各相顧失色，於是結成神聖同盟來干涉法國的革命了，與革命「背道而馳」自然要火上加油，越發煽起「革命的法國」的民族主義的火焰！革命的法國不反對他們反對誰呢？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外交政策，則完全另一回事，如何能比擬法國的大革命？前者是侵略主義；後者乃是人類歷史上一件頂偉大的革命行動。後者的直接利害只及于本國，前者則是直接影響到他國的生存根本問題，又如何可以相提并論？因此；干涉革命的法國之軍事行動乃是反革命的勾當；干涉日本侵略中國的外交政策乃是偉大國家與民族之革命的行動。不然，便是爲善不足，見義不爲。假使當美國獨立運

動時，法國也抱着史汀生先生同樣的見解，袖着兩手不加幫助，則美國雖立運動在當時是否可以迅速成功，未可知也。

十一 史汀生氏的結論

史汀生先生的言論及列強解決中日的爭端的條文有下述一點，我們不能不鄭重辯明。他說：

「此項決議案之未來效力，端賴雙方當事者，能誠意實施其不再發生敵對行動之誓言。」（曹譯頁六七，原文P.81）

而英美各國調停下的中日結束上海戰事的協定，一則曰：「中日兩國自是停止一切暴力行動」。（曹譯頁一二六，原文P.148）再則曰：「中日兩國無論如何，不得再作增加敵對之動員或準備。」（曹譯頁一二六，原文P.148）這些雖然是外交詞令，但牠裏面却表示很大的不公平，即照史汀



生先生和李頓調查團報告來說，中國政府及其軍隊自始至終沒有對日有一「敵對行動」，更無所謂「敵對的動員或準備」，日本軍隊一直從朝鮮打到遼寧，打到黑龍江，打到錦州，都可以說，中國是沒有什麼敵對行動的，即就上海之役而言，純是日本壓迫太兇，而十九路軍究未完全遺忘他們從廣東北伐以來的革命精神，遂激而發生抗戰。現據史汀生先生及列強調停的協定條文所言，則是把侵略者的軍事行動與被侵略者的自衛行動，等量齊觀了。有了這種不論曲直，不問是非的調停，那侵略者又何樂而不侵略呢？總而言之：日本既侵略中國，中國自應無條件地抗戰；仗義執言的列強只應責備侵略者，禁止侵略者，不要再有軍事行動，被侵略者之準備自衛的任何行動，都是應該的，不能負戰爭爆發之任何責任的。以前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直到日本帝國主義者取消侵略行動為止。

綜觀史汀生先生所論，把牠歸納起來，大致是：

一 日本之軍事佔領東三省完全出於侵略的野心。

二 日本侵略東三省的種種口實都不能成立。.

三 東三省無論在法律上，或行政上，或人口上都是完全中國的領土，而日人所謂「特殊權益」也無根據。

四 日本之侵略中國，美國政府始終抱着「不承認」的態度，但是對於日本的行動除了藉助于世界輿論及和平方法外，不贊成施用他種制裁。

五 中日爭端必需由中日兩國自己同意之方法解決之。

六 中國的和平抵制的方法，在爭端未解決前，必須保持，不然恐怕中國完全降服了日本，或武裝了自己，而成為一個軍國的國民。

七 國聯盟約已成廢紙，國聯機構，已失效用，但仍須保持。



八 世界和平必須保持，但對於強者的侵略弱者也只能用和平手段處理之。

十二 遠東問題的展望

史汀生先生所描寫的「遠東之危機」，不但仍然存在，而且日益加深而擴大；而史汀生先生希望用以解決遠東之危機的手段和信條，更加渺茫，然則世界的和平真沒有希望麼？難道熱心和平的史汀生先生再沒有努力的機會了嗎？那又不然！依上述的消極的分析我們至少可以簡單地作如下的答覆：

一 和平並不是維持現狀，而是世界的人類完全立在經濟的和政治的平等基礎上相互地生活着。

二 所謂「集體全安」應當建築在上述的和平基礎上才是真正的安全。

三 反乎上述的和平，絕不是公道的真正的和平，並且是絕不會和平

的；反乎此的集體安全不是真正的集體安全，也絕不會安全。

四 和平不是仁愛的幻想，而是人類實際生活之各得其所的一種現象。不幸這種和平被人擾害了，破壞了，那只有用大眾的力量來保障，來爭取，空言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五 無條件地空口說和平，終於變成幻夢，太平洋及全世界的和平之第一個先決條件，乃是中国由積極抗戰而擺脫日本的侵略和束縛（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亞等自然沒有例外）。同時美國的偉大政治家及其偉大的民衆必然會予我們以積極的援助。

六 中日兩國必定會合作的，而這一合作之決定的因素，乃是兩國大多數的民衆。他們到了某一時期會攜手的，必須直到他們實行攜手，真

正和平才有可能。

七 太平洋兩岸的中美兩大共和國，爲着太平洋的真正和平及全世界的真正和平必須攜手，不止是中國現在需要美國之有力的幫助，並且美國也必需緊緊地並且誠意地和中國握手，美國才有光明的前途，這一層史汀生先生的遠見已經看到了，他不是說：

「居於日本島後大陸上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未來之發展，對於美國太平洋上之最後關係將有極大——雖非極重大——影響。」史汀生先生所謂「最後關係」未曾加以明白解釋，固難懸揣，但我們從太平洋現在各國的關係及其鬥爭的形勢以及此種鬥爭在將來之發展來看，到了最後，自然是必需用戰爭來解決。在一鬥爭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的民族運動一定會有驚人的發展，同時也就對於美國在太平洋的利益之最後關係有着決定的

意義。史汀生先生所謂「最後關係」大概指此。到了那時遠東的危機所孕育的戰爭，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而從此一大戰爭中，孕育出新的國際關係，新的和平也是必然的！質之史汀生先生以爲何如？

最後我們還要對史汀生先生聲明：本文有許多過於直率的地方，這是因為史汀生先生是一個非凡遠見而又對於中國素表同情的政治家，並且是我們的友邦美國的大政治家。中國有一句古諺道：

「唯善人能受盡言。」

想史汀生先生必樂意接受中國民衆的公意吧。

遠東的危機

每冊實價一角
埠外酌加郵費

主編者

陳

樹霖

出版者

彬

前導書局

發行人

龢

曾國範

發行所

著

廣西桂林
前導書局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43058





80.10